

九死犹未悔: 作为 人格精神的“归来”作家群

毕光明

归来: 是文学现象, 也是文化现象

文学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现象: 不是个别人, 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 而是外在的力量, 使得一批, 一群作家集体放下了笔, 暗哑, 沉默, 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无一例外地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而后, 几乎是在同一个早晨, 却又一个一个、接二连三, 令人新奇令人惊叹令人感慨地“复出”, 在沸热的文坛上聚集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 他们是在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而被赶下文坛的作家, 或者更早一些, 是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连坐”的诗人。他们把自己重返文坛后的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艾青), 将自己复出后的吟唱称作《归来》(流沙河)和《归来的时刻》(梁南)。人们把他们叫作“归来的作家群”。

归来的队伍如此庞大, 成就又是如此显著, 以至当今和未来的文学史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青睐。仅举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 艾青、公刘、王蒙、张贤亮、流沙河、周良沛、邵燕祥、牛汉、曾卓、鲁藜、陆文夫、高晓声、从维熙……就可以感到沉甸甸的分量。二十余年的放逐意味着身心的摧折, 人生的苦难; 对生命个体来说, 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流沙河的《人与船》就典型地譬写了人生失落的伤感。王蒙也在《海的梦》里借年过半百的缪可言流露出了误了“季节”的惆怅。然而, 从文学的角度看, 一代作家的人生磨难换来的却是当代文学的进步和丰收, 尽管谁也不愿意以真实的苦痛去换取事后的殊荣。艾青在古稀之年, 出现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为中国和世界奉献了一批以《古罗马大斗技场》为代表的深切地关注着人类命运的诗歌。王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等小说家以扎实的生活内容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概括力, 把现实主义精神带回了文坛, 在新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反思文学”中, 他们的作品所占的比重最大, 具有扛鼎的意义。归来作家的创作一个明显的特点, 是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的内容有直接的相关性。作者本人或是同类在当代政治灾变和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生活, 成了主要的创作题材。

将个体命运, 而且是非剧命运, 作为表现对象, 这是归来的文学区别于“二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之处。文学从政治的附庸的可悲地位解放了出来, 面对严酷的生活真实, 试图回答人生面临的问题。但是, 当我们发现, 无论多么深重的苦难, 无论多么难于接受的残害, 悲剧的主人公都没有改变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 归来的文学包含了太多的文学以外的意义和功能。当作家不只是把厚积薄发的文学上的成功当作人生失落的一种补偿, 而是将他们所遭

受的冤屈、挫折、艰苦和磨难看成是生活的非常态的一种补偿，是人生价值的另一种形式的证明时，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也就在这些幸运的当代“屈子”们的身上复活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从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问题，后来人难以理解梁南诗中所表达的对党和祖国母亲的十分痛苦却又是无比虔诚的爱，也不会相信范汉儒（《雪落黄河静无声》）的情感逻辑和是非标准在生活中确曾发生，自然，也只能把许灵均（《灵与肉》）的选择看成是一种愚傻。

答案在于，对归来的一群来说，文学不是无涉功利的。当初因文学而蒙难，其“罪”就在有太强的社会责任感：替人民说真话，当然要触怒愚弄百姓、违背人民利益的极左势力。受苦受难并不可怕，只要个人是划归在人民的行列里。作为依附性的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淑世精神，在当代的新表现形式是投身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的集体事业。中国先秦以后的文学家，没有不熟读屈原的作品的。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屈原热爱祖国矢志不渝，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政治理想和执着行为，不仅是一代一代用世知识分子的行动楷模，而且作为一种人格精神沉淀到知识人的灵魂里。当事实上从以辅佐人主、拯救苍生为己任的位置上被排挤了出来，流落为空怀才具的边缘人时，这种人格精神就具有自我论证的紧迫性。屈原用冠绝千古的诗篇《离骚》记录了他灵魂挣扎的痛苦历程，也完成了他的人格形象自我塑造。对于当代有着类似的被贬遭遇的知识人来说，创作也是一种自我表白。被现实所阻遏的理想只有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延伸，文学因此具有了生存方式和价值选择的文化意义。

归来的作家，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仿《离骚》。张贤亮的《灵与肉》唯恐人们领悟不了主人公的屈原式的选择，干脆给人物冠上“灵均”的雅号，以屈原自许。从一种文化传统或曰传统人格来说，许灵均在中国的土地上历尽凌辱和磨难，却放弃了跟离散多年的生身父亲去美国继承百万资产当老板的令人艳羡的机会，而决意留在哪怕给了他屈辱和苦难，但更留下过他的眼泪和汗水的贫瘠而温馨的祖国的土地上，是完全符合他的文化教养和性格逻辑的。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能获得什么实利，而是得到个体所依赖的群体的承认，（不仿称作“恋母情结”）正如王寿南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为社会人群作奉献的责任感”^①，而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以人格的完成达到精神的满足从而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而获得不朽的“历史生命”。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主人公也是从名称上就赋予了一种文化特性的。他谈到他的名字的来历：“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而他本人，也正是把屈原精神作为人生准则，说：“尽管我们历史沧桑，却没有做过一件有损于国家的事情，我常想，屈原受了那么多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楚国土地呀！最后，还是投进了汨罗江，被后代称之为千古忠魂！”小说中描写的了范汉儒的节操，几乎可以同屈原媲美，他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关进劳改农场，成为囚徒。然而在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从未改变过炎黄子孙的信念，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甘愿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终生做一个黄河边的纤夫。

诗人梁南更是把归来一代的精神世界的展示推向了顶点。组诗《我追随在祖国之后》扒开了殉道者赤诚滚热的胸膛，让人们看《我这样爱过》：“在恋爱中痛苦了一辈子，／一辈子都在痛苦中恋爱……／诅咒他，背弃她么？不！／我宁肯毁灭于痛苦的爱。／……痛苦是爱的必要补充；爱是痛苦永恒的期待。”“我这样爱过，真的，我这样爱过，／祖国会理解

我：爱的痛苦，痛苦的爱！”爱竟然以痛苦为伴生物，痛苦竟然具有吸引力，这真是叫人迷惑的爱，然而又是不可怀疑的爱：它是命运的真实，而后才是心灵的真实。在另外一首诗《我不怨恨》里，他把对人民和祖国的爱表达得触目惊心。诗人把自己比做“草叶”，当黎明以玫瑰色的手向草地赶来了骠悍的“马群”，草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但仍然亲昵地伸向马的嘴唇，无怨地奉献自己。他又把自己比做“鲜花”，即使被马群踏倒，也仍然抱住马蹄狂吻，这也是痛苦的爱，因为所爱的人正是抛弃了他的人；而又是始终不渝的爱：“我死死追着我爱的人，／哪怕脊背上鲜血滴出响声”，爱的悲剧如此真切，坚决、苦涩、虔诚。这种无条件的爱，以历史的继承性，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

阶段性的主题和手段：归来文学的误区

特别希望通过群体来确立自我价值，特别渴望有限的人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偏偏被社会所抛弃，对于功名欲极强的读书人来说，这是莫此为大的人生悲剧。精神的灼痛往往可达到极点，内在的燃烧可呵喷出充满怀疑精神的激越愤懑的《天问》奇篇，而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利用自我辩解、自我欣赏来求得心理平衡，得以避免精神的最后崩溃。屈原的一个原型意象——香草美人以喻德操之高尚，为读书人的自怜自爱、自珍自重开了先例。周敦颐的《爱莲说》也加强了知识分子用洁身自好来应对逆境或逃避现实的风气。这种精神的自我加冕的方式是现实困顿的无奈之举，也透露了知识分子强烈的自我实现愿望。难怪浩劫过后，那么多的诗人写“珍珠”、写“贝壳”。梁南写过，白桦写过，流沙河、周良沛也都写过。没有什么比这曾被埋没而又不失其价值的珍品更能恰切地作为被漫长的岁月所湮没的作者的自况了。“常林钻石”一时成了归来诗人纷纷咏唱的对象，流沙河有诗，艾青也有诗，这是一种被发现的惊喜和期冀。

周良沛的《珍珠》包含更多的信息，诗人要肯定的是珍珠的信念价值：“最终，它只能是无价的，／生活的信念，真理的追求，／璀璨纯净的感情——／一颗真的珠，真的心……”。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持护一种信念时的盲目性和被动性，以及它的心理潜力：

我一直——等，等，等
我总是——信，信，信
相信地上的房子都能打开窗门，
等见到阳光不会眼花头晕。
象沙在珠蚌里磨磨磨，
象珠在蚌沙里滚滚滚，
在等得难熬中，还等，
在信得难以相信中，还信。

在这里，价值不在于信念的本身，而在于死死抱住信念这一行为。透过这样的“珍珠”，我们发现了传统的文化精神遗传给当代知识分子的非理性的因子，或者说，看到了屈原精神在当今知识分子身上的变异。如果说在屈原那里执拗于一种政治主张，怀抱着爱国热忱是伴随着与腐朽的政治势力和一种卑贱人格的对抗，因而具有实践意义和积极性的话，那么，有些归来作家笔下的受难者就把一种消极等待和对一种空洞概念（它的实质内容已被抽去）的宗教

式膜拜当成是有价值的自我求证了。范汉儒以“中华民族一个腐儒”自居、自矜，他的所做所为，也无非是这样的动机：“我只想管好我自己！在这乱世之秋洁身自重”。这不过是传统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现代翻版。他的全部行动（不如说没有行动）根据和价值标准就是他时刻挂在口头上的“炎黄子孙”。“祖国”不是实体而只是一个字眼在他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神奇的功用。他拒绝了最简单的理性分析，完全不顾陶莹莹当初的出逃尽管是错误的但事出有因，服法之后她为自己罪孽的深重从未停止过自责和忏悔，而纯粹是感情用事地将这个不幸的女性，他的患难中的可爱恋人，一把推进了“背叛祖国”的永难超度永无解脱的深渊。崇高的爱国感情是谁也不能否定，不容亵渎，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和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纽带。但是象范汉儒这样缺乏理性基础也缺乏人性基础的概念崇拜，未免叫人怀疑他的牺牲的价值，而且我们要猜测这是人格被一种极左的政治文化和荒谬的现实所扭曲的结果。

事实上，当历史总算给予了一个重新估价知识分子的机会，在一段时间里，归来的文学负担起了知识分子自我形象塑造的任务。王蒙的《布礼》、陆文夫的《献身》、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林希的长诗《无名河》、张贤亮的落难小说和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一起加入了这场文学协奏。与其说再现冤案下的一代人的命运图景，不如说是一种无端蒙垢的政治人格的自我辩解、自我洗刷。这是同来自外部的组织上的平反相补充的自我平反。也许当事人未曾料及，在这些终究要被他人和自我超越的带有强烈的自我申辩色彩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在历史法庭上于受害者并非完全有利的自我证词。他们要极力表白的是：我们清白无辜，就象“七月派”诗人在编选他们的诗集《白色花》时在扉页上摘引阿垅的诗句作为对他们的政治和艺术生命的自我判决：“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中国知识分子把名誉、人格形象看得同生命一样宝贵，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就指出过“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衍生和挑选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②。但屈原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忽视了人格形象的完善并不等同于知识主体对推进历史发展所做的实质性的努力。强烈依赖群体鉴定的另一面，是过分的自我关注。当“独善其身”带有太强的个人性时，执着理想就可能流于形式，对于“信念”的崇奉就容易变成对挺身而出维护真理和正义的更大危险的一种逃避。这就是为什么屈原之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不乏其人，而理想破灭、宁付清流的绝难见到的缘故。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历史的曲折处，真理和正义只有靠人心来保存和传递；相对于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者，不介入至少是一种进步。然而，不正是用对抽象的崇高概念（语义在意识中升值）的依附来逃避对社会实体的表态，使恶行得以畅通无阻吗？归来的文学中的主人公，很少意识到他们的美德同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也有关系。《布礼》里面的钟亦成对于党的忠诚可以说到了毫无瑕疵，苍天可鉴的地步。可这个跟党血肉相连，纯而又纯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顷刻之间叫人难以置信地被“分析”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判定为人民的敌人之后，他一方面不改痴诚，一方面还要按照形势的需要去发掘自己被划到敌对阶级去的合理性，从“积极的方面”去接受错误路线对他的戕贼，以此表现他对党的另一种形式上的忠诚，这种盲目的信任跟屈原尚且坚持同围绕着昏君的靳尚、子兰之徒相斗争是没法相比的，我们看到的是封建意识以革命形式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的显现。对个人名誉的极度关切是以放弃人民的真正利益为代价的。《雪落黄河

静无声》的叙述者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评价：

崇拜廉正，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而“六点钟”的行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在这块物质、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

人们不禁要问，当历史的主体——人民，都在物质和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痛苦辗转时，这“美德之花”对他们又有多大的救益？

人格形象的膨大，潜伏着人格精神的真正的失落。不难看到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政治的压力下，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形。钟亦成之辈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是盲目的而不是分析的认同一种理念，以致屈服于历史的挫折。他和凌雪把极“左”行为对他们的无理剥夺，想成是母亲错打了自己的孩子，过后还要抱头痛哭。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可贵的单纯和天真。这种单纯和天真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社会主义革命，新生的共和国，也因这种单纯和天真付出了代价。

也不难找到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和依附性形成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直到历史新时期，知识分子才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在此之前漫长的民族历史上，知识分子因为既不是权力也不是生产力的掌握者而游离在社会主体之外，他们的人生价值只有在找到一个能依附的实体时才可望得以实现，这就使得他们在经济实体和概念实体发生混乱时，错把后者当作畸零人格可归栖的大树。

超越感性与归依大众：历史进程中智识人的悖论，也是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看成历史的主体，这对我们的文学分析具有指导意义。

归来的文学不可能一味地停留在自我澄清的感性层次上。随着新时期文学反思意识的加强，作为一个艺术群落的归来作家渐渐消溶到多元探索的文学大潮中，但仍然有人专注于探讨所属阶层，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以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改革为这一艺术思考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归来作家的历史遭遇、命运悲剧得到了新的角度的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相对健全的表达，人格形象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光照下有了一定的矫正。在这方面，张贤亮的小说就代表了归来文学的应有的自我超越。

张贤亮以《灵与肉》饮誉文坛之后，连连爆发出有争议的作品。在骤然解禁之后冒进和僵固，浮躁和呆板并存的文坛上，张贤亮的有中心意向贯穿的系列作品常常遭到误解。《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甚至招来了物议，而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中的小说正是他艺术思考更深入更成熟的产物。不用说，一个肉体 and 灵魂都在炼狱里痛苦地煎熬过二十几年的作家，是难以摆脱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张贤亮本人也不讳言从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他说得很明白：“二十几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

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③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无不贯穿着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思考。既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社会改革，他也就可能不为知识分子在历史舞台上寻找到恰当的位置。张贤亮有很强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这是他跟王蒙等人的不同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长处和弱点。所以他不把知识分子跌入生活底层看成是没有意义的惩罚。他用对改造过程的肯定来证明苦难使他成为有价值的人。他对苦难的崇拜基于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里点了出来：“凡是吃过苦，喝过碱水的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需要区别的是，苦难经历在张贤亮这里不是索取补偿的资本，而是知识分子在通过感性获取理性的必由之路，张贤亮的知识分子人格形象是感性充盈而又理性坚实的丰满的整体。

张贤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清水里泡过三次，在血水里浴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的幸运的受难者，他以知识分子的敏感多情咀嚼了残缺人生的痛苦与甘甜，和底层生活的艰辛与美丽；他又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和好沉思好追问的性格，固执地对人民命运和历史规律进行深刻的剖析和省察，试图提出一个合理的社会构成模式。这样，小说世界就成了个体生命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二重组合。张贤亮小说的主人公确实带有自传色彩，但作者塑造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是在反视自我。构成他小说最重要的美学手段是反讽，也就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感受、价值认同跟作品以外的客观生活、社会公理可能是不相吻合的，或者恰好相反。作品的主题因而显得深邃而不易捉摸。需要进一步把握的是，在他的小说内部有一个自身的论证循环，即，只有通过感性的接触才能达到正确的理性，而理性的掌握又是为了消除低层次的感性存在；但如果具体感性被省略，理性结论的真实性便无从验证：作者的全部困惑就产生在这里。正是这样的二律背反，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魅力。理念是构成张贤亮小说的重要内容，尽管理性思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的艺术描写的完美性。

出于理念表达的需要，张贤亮的小说设置了一内一外两个相套合的结构模式，其外在模式是落难的读书人与劳动女性的纠葛。许灵均与李秀芝，石在与乔安萍，章永璘与马缨花与黄香久，前者落难之后总是得到一个外貌美好、心地善良的劳动女性的怜悯同情，痴心的爱抚。这种男女关系的设置至少有两重意义。第一，它是生命现象的描写，是人的生活写实。人分为男和女是不可解释的生命之迷。男女互相依恋、产生爱情是生命活动的自然规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人的世界的本体构成，描写这种关系是文学的由来已久的题中之义。在这一层面上，张贤亮用以揭示人性，也凸现了被“文明”遮蔽了的人的权利。第二，它是社会现象的象征，用男人和女人来隐喻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及生存土壤的关系，这是张贤亮精心构筑的小说的“高层结构”。

与此相关，小说的内在结构模式是灵与肉的冲突。灵肉二元在作品中衍化为多个两两相对的程式，即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事业与爱情，精神活动与生理行为，历史与伦理，经济学概念和人生，智慧的结晶和激情的冲动，严酷的现实和超时空的梦境，赤贫的生活和华丽的想象，一连串的抽象的范畴和一个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女友……，囊括了特定生活世界的全部丰富性。这些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范畴，又分别发生在生命现象与社会理论亦或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这两个不同层次上，而又往往是由一个层次开始，进入到

另一个层次上,两个层次的冲突又由艺术上的象征贯通起来。《绿化树》把这种冲突写得生动而真切,“铁的现实”逼得章永璘不止一次地“堕落”,调动读书人的小聪明去谋得吃食,而肉体上的痛苦稍一解除他又为文明人的精神痛苦所折磨,求生本能与精神需求就象两重不能同时踩踏的阶梯,使章永璘感到被撕扯的剧痛,而能够意识到灵与肉的不同需要,正是文明人的标志,它标明章永璘高于他的生存环境,在意识到人的本质后,产生超越自我和他人的愿望对知识分子的章永璘来说不仅势所必然,也是他的责任。章永璘的读书条件是劳动女性马缨花为他营造的,但是读书却使章永璘意识到了他和她之间的“一种很难拉齐的差距”,对于只能感性地对待读书人的马缨花,他不能不发生感情上的变化,灵与肉的冲突的另一种形式,即感性与理性的扯不平,就通过艺术的象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又展开了。章永璘与马缨花的人生纠葛,扩大而为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存在关系了,而这正是张贤亮系列小说的中心意向性,也是他的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模式之处。

张贤亮在表现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的关系时,在肯定二者地位实际上相同、命运与共的前提下,首先形象地揭示了二者的差别。后者一切都诉诸情感,例如马缨花,包括海喜喜、谢队长对章永璘的爱护和尊重,这些情感来自于直接经验。而前者由于能够间接地从书本上得到人类文明的大量知识财富,因此并不轻信现实,而总是理智的眼光权衡对象。劳动者为活着而活,读书人却要弄清了活的目的、活的意义才活。有决定意义的是,跟马缨花只知道读书好,男人就该读书不同,章永璘能从读书中发现历史的因果链。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前者能清醒地意识到与后者的不可拉平的距离,而后者却不能意识到,只能感到,这固然是后者的悲剧,但在这一悲剧里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个悲剧:后者既然意识不到同前者的真正差距,那么也就意识不到前者将要为拯救和提升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不被理解,正是章永璘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

但是,张贤亮对知识分子自我估价没有停留在这里,他也不强调知识分子的上述悲剧,他要展现的是章永璘这类作为文化杂交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为完成历史使命而努力抛弃先天不足,成长为真正的唯物论者的心灵历程,所以他把当代知识分子个人实现的悲剧都淡化了,而用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去烛照知识分子的灵魂底部,不留情面地榨出里面的“小”来。因此小说中往往拿知识分子的弱点去比劳动者的长处,把前面提到的差距写得很模糊,而把相反方向上的差距写得很具体,不再是自我粉刷而是自我暴露。在《绿化树》前后的《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里,章永璘都把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同知识分子的患得患失、计较私利、表里不一、情感不稳定相对比,同那种一味替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小说比起来,张贤亮多少直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现实,而这正是前期归来文学所缺少的理性精神。

更重要的,张贤亮总结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接触的意外收获。他们先天的生命贫弱症在粗粝的劳动中得到了医治,劳动者身上保留的原始野性,粗犷、强悍的生命力给他们注进了新的气息,他们先前所困惑的社会政治理论,也在他们目睹的劳苦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面前得到了检验,显示了它的荒谬性,他们的理性精神自此在一片丰沃的感性土地上健康地生长。还有劳动者的纯朴的品格,善良的心地,乐观的性情和为他人着想的献身精神,都对知识人因焦虑于自我的实现而浮躁不宁的性格起到了清心败火的作用。张贤亮肯定知识人与劳动者接触的积极的一面,不是某种书本理论的启示,而是当代社会的严峻现实和他本人的生活道

路、切身体验，使他认识到正确处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华民族纠正错误、朝世界先进行列看齐所不能不做出的选择。

张贤亮的这些思想，似乎跟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的提法相吻合。其实他们之间有区别。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相结合道路，它本身并不错。它是针对“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封建文化意识造成的智劳脱节而提出来的，它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有积极意义，但这一口号到当代社会就演变成了抑制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戒杖。它不是以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目的，而是以把知识分子拉平到“筋肉劳动者”的认识水平，让理性溺死于感性，用野蛮改造文明为归依，这是十足的蒙昧主义。（《绿化树》那么细致入微地刻划章永璘在“狼孩”与人的边缘上的剧烈的灵肉冲突就是为了批判这一反文明的做法。）他的后果是使接受过人类文明的人虽然肉体上没有被消灭，但神经、器官为精神的饥渴折磨得萎缩、扭曲和退化，于是他的精神再也生产不出一点产品了，只能在怀疑与恐惧之间徘徊。（《霜重色愈浓》）张贤亮的思想观点却正是对这一反文明的做法的反拨。他的智劳结合基于这样的估价：知识分子在文明程度上是高于筋肉劳动者的，只有人类智慧才能真正改变和提高劳动者的低下处境。但知识的掌握者需要到服务的对象中得到验证，并吸收他们的某些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完成自我超越并实现全社会的超越。所以，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关系，至多是互补关系，而决不应该是后者来改造前者的关系。《绿化树》揭示的就是这种关系。小说的外在模式用男人和女人来隐喻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和生存土壤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张贤亮的独特认识。他不把人民与土地比作母亲，而把知识分子同他们的关系看作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到劳动大众中确定他们的价值，从他们那里获取生命活力，但他们又不可能停留在后者的感性存在，而必须超越他们，并且是为了他们而超越。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为生命个体的章永璘，他的男性本能的丧失，从心理学意义上是长期心理压抑的结果，而进入社会层次以后，就成了知识阶层被唯心主义、教条主义阉割而不能成为独立的有用的人的象征描写。抗洪抢险中他的献身举动，在群众面前证明了他的价值，小说虽是描写他和黄香久石破天惊地发现他的男性本能在突然间恢复了，实际上是跟抢险事件联系起来，说明知识分子能够也只能在作为社会另一种主体力量的劳动人民那里得到确证。而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与职责便是在获得承认之后义无反顾地摆脱感性层次，理性地奔向人类先进文明的呼唤。

可以看到，章永璘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已经打掉了旧式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而真正地眼睛向下。这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结果。《绿化树》里章永璘夜读《资本论》的情节曾为人所嘲笑，殊不知他这类出身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才获得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唯物主义者，把社会生产力和劳动者经济地位的提高当作历史前进的真正标志。也正是采取尊重社会事实、生活真象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文学才有可能澄清长期以来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的理论上的混乱。

归来的文学主题上的这一深化，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积极的价值认同与人格建构，它给影响中国知识人二千余年的屈骚传统注入了崭新的内容。